

XIFANGFANYIJIANSHI

谭载喜 著

西方

翻译

简史

商务印书馆

0146078

西方翻译简史

谭载喜著

西

方

商务印书馆

1991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内容包括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和现代等五个历史时期西方的翻译实践史和翻译思想发展史，从古罗马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作品，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中欧美几个主要国家翻译理论领域的最新成果。

本书史料翔实，覆盖面广，自古至今涉及了近三百个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并涉及了与翻译有关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者本着忠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原则，采取提纲挈领的写法，对史料没有简单罗列，而是在对西方翻译历史全貌进行综合性叙述的基础上，对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作了重点介绍，使读者可以溯其源而观其流，对西方翻译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历史既有个全面的了解，又有个重点的掌握。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翻译史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且叙述简洁，可读性强，适用于翻译工作者、翻译理论研究者、中西方对比文学和对比翻译史研究者、以及大专院校外语专业的师生（可作为大学翻译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同时也适用于一切爱好翻译和外国文学、希望了解西方文明的其他读者。

XĪFĀNG FĀNYÌ JIǎNSHĪ

西 方 翻 译 简 史

谭 载 喜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509-4/H·182

1991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49千

印数 0-1 400册

印张 10 5/8

定价：4.30元

代 序

大胆的尝试, 可贵的创举

——《西方翻译简史》读后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活动。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二千余年,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随着时间的推移,涓涓细流业已汇成长河大川,特别是在本世纪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结缘之后,波澜壮阔,奔腾咆哮,颇有一泻千里之势。由于锁国多年,我国对西方在这一学术领域内取得的进展情况所知甚少;自开放政策实施以来,评介西方有关论著的文章和译著虽逐渐增多,但在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成果方面可以说几乎还是一张白纸。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谭载喜*于70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留学英国,主攻语言学和翻译理论,获埃克塞特大学硕士学位。他经过多年的积累和钻研,终于撰写出这部《西方翻译简史》,有重点、有分析、有系统地勾画出欧洲和北美翻译事业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演变的概貌,以期填补这项空白。这是令人不胜感慰的。作者自谦,称《简史》为“一次大胆的尝试”,这话也不无几分道理。我作为这部史稿的第一个读者,于披阅之余,深感作者在既无国内的先例可循又缺少国外的蓝本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带开拓性的科研工作,实属难能可贵。故愿以“大胆的尝试,可贵的创举”为题写几句读后感,权作“代序”。

《简史》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方翻译历史画卷。它追源溯流,对古罗马以来各个时期西方译事的发展变化、主要流派林立及

* 现为深圳大学副教授。

其动向,以及有关历史事件作了概要的回顾,涉及的人物不下三百人,对其中杰出的翻译家和理论家的经历、代表译作和论著大都作了重点介绍。史料翔实,叙述明晰。显而易见,取料是经过辛勤蒐集,爬梳剔抉,去芜存菁,综合加工后撰写而成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吸取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筛选后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对有关译作和论著及其时代背景和所产生的效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语,并贯穿于写作的全过程。虽然,由于原材料的分散与芜杂,所取史料及所提看法不可能没有疏漏或偏颇之处,但本书作为一次尝试,却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and 可读性。

采取按西方通常的历史分期(即分为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现代)并与翻译活动本身进程相结合的论述方法,是《简史》的另一特点。其长处是,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随着民族语言的成熟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以民族语取代拉丁语译“圣经”以及古典的和同时代的作品活动便得以普遍开展;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译事带来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以及现代科学对翻译理论以至具体操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翻译理论专著也随之频频问世;以及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之间的论战由尖锐对峙而趋向缓和以至谋求弥合的趋势,等等。不过,《简史》采取的这种按历史分时期、分阶段的写

法也有一定的短处，即不易使翻译活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一般的历史分期完全吻合，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自然，关于译史的分期分段也并无一定之规，只要求得大体上有个界限也就可以了。

综观西方译史的全貌，不禁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方面，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另一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作者所说，迄今并未能形成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这显然是由于：翻译乃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活动。究其原因，当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致：两种不同结构和习惯用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语言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不同文化和传统习俗之间在转移上引起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以及其他学科的渗透和侵入，等等。于是，人们按各自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 and 对待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而产生千姿百态的译作和各持己见的主张和流派，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威尔斯在其论著中指出，西方理论对描绘“翻译”这个名词所用的术语竟达十余个之多^①。出现这种情况，自非事出无因。基于同样的理由，于是有把翻译比作绘画、雕刻、摄影、演戏的，有对翻译进行各式各样的分类的，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有层出不穷的流派和观点的出现。至于具体的翻译活动，则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人因时因条件之不同而各异其趣，鲜受条条框框的束缚。正如凯利所说，“倘若翻译依靠理论而生存，则远在西塞罗之前就夭折了。”^②可见，理论固然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但生活之树常青，千万人的翻译实践始终是活水源头，实践总是要打破理论，而理论也总要求得不断的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乃是一项既古老又年

^① 参见威尔斯 (W. Wilss, 1925—)，联邦德国翻译理论家，所著《翻译学：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英文版，第26—27页。

^② 参见凯利著《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L. G. Kelly, *The True Interpreter: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West*)，英文版，第219页。

轻的事业。

如此说来,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是一个长期难以定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到对翻译的前景作何种预测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的翻译研究与现代科学和技术攀了亲,形成多边缘交叉的现状,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研制进入模拟人脑活动阶段之后的今天,人们(主要是语言学派的理论家)对翻译的看法便越来越倾向于认定它是一门科学了。奈达有题为《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之作,巴尔胡达罗夫在其著《语言与翻译》一书也中提出“翻译学”这个术语,并认为“从各个不同角度研究翻译的各门学科,可以总称之为翻译学。翻译学的核心部分是翻译的语言理论,围绕这一理论还有翻译研究中的其他流派,如文艺学派、心理学派、数论派等等。”^①然而,浅见以为,翻译这门事业是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商榷之余地。理由简述多次。翻译同语言和数学近似,它既不隶属于经济基础,也不隶属于上层建筑,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而是人类用以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把一些学科中研究翻译的各个边缘交叉部分统统都加起来,也并不足以成为认定这门学问本身就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充足理由。威尔斯对“翻译学”一词加了许多限定语。巴尔胡达罗夫也指出,翻译理论“甚至主要并不是规定性科学”,而“主要是一门描写性学科”,尽管前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看来乃是由于人类对自身脑子的知识还非常贫乏之故。正如斯坦纳在其论著中所指出,“我们并不了解人类的言语在脑子里的活动情况……假使有几种语言在同一人脑中同时并存,它们是怎样安排、怎样储存的,我们几乎一无

① 参见苏联巴尔胡达罗夫著、蔡毅等译《语言与翻译》,第2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 同上书,第25—28页。

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有象样的翻译理论呢?”^①又说,“翻译究竟是什么?”“人的脑子究竟怎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的?人们对这些情况也是“含糊不清”。^②“语言怎样使用,怎样理解,在关键的地方因人而异。……我们所研究的不是一门科学,而完全是一门艺术。”^③奈达殊途同归,近年来他改变原先关于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捨前者而取后者,并声称翻译才能是“天赋”的,从另一个侧面肯定翻译是艺术或技能。但是,问题并未因此获得圆满的解答。近年来,西方进行人工智能的研究,正在力图通过计算机实现“人——机对话”,以期使计算机“懂得”人类社会所使用的语言、达到不同语言之间转换自如的目的。西方翻译界还致力于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是否意在使语言学按数学的模式,使语言摆脱过去长期采用“定性”和“归纳”的方法,转为采用“定量”和“演绎”的方法,以期有朝一日使一种语言顺利地转换为另一种语言,达到用机器代替人工从事翻译的理想目标呢?不久前偶然看到一则电讯,说美国一家杂志预言,到本世纪末全世界就可以普遍使用电脑进行翻译了。果然如此,那真要谢天谢地,数以万千计翻译工作者便可以从“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严复语)的窘境中解脱出来了。而翻译这门学问便终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科学。这个理想极富魅力!是否能实现呢?眼下实在无法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类的语言体系具有极为复杂的性质。有“科学的语言”,有“艺术的语言”^④(可以说,还有“说理的语言”),前者或许有可能使之全部数学符号化,以纳入计算机的软件,后者有无这样的可能呢?何况还有许许多多的模糊语言。即使计算机不断升级换代,数学计算的程度日益精密,是否能处理大

①②③ 分别参见斯坦纳著《语言与翻译面面观》(G.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英文版,第294,278和295页。

④ 参见金克木著《诗如何传达信息》一文,载《读书》1986年第5、6两期。

量的模糊语言也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即使所有的问题都能获得解决，生产出来的译品想必会是千篇一律，人世间也就不免要失去原有的生机和光泽！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文艺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以加切奇拉泽为例，这一派并不否认语言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相反，他主张文艺翻译“应当千方百计地开展各种语言层次的对比工作，包括修辞对比，以选择最恰当的语言手段，充分表达原作的思想或形象。”但他强调文艺翻译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原则。”^①显而易见，任何文体和题材的翻译都离不开语言符号这个信息载体，文艺翻译自不能例外。可是，正如精通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能成为文学家一样，掌握两种语言的人也不一定能成为合格的文艺作品翻译者。因为还需要具备其他的条件，如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创作才能以至“天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的趋向。在西方学术界处于现代综合思潮迭起的冲击下，翻译研究自六十年代以来也进入了要求综合或统一的新阶段。^②以往尖锐对峙的苏联两大学派之一的代表人物费得罗夫也曾表示：“当代是各门科学空前协作的时代”，“现在仍然坚持在文艺翻译的理论中只有走文艺学的路子或只有走语言学的路子才是恰当的，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落后了。”据此，巴尔胡达罗夫认为，这两派的理论“应当在共同的综合性的学科——翻译学的范围内进行协作。”^③他在书的结尾处还引用奈达的话强调指出，我们应当永远牢记：“翻译——它的含义比科学要广泛得多，它也是一种技能，而高质量的翻译，归根结

① 加切奇拉泽，苏联文艺派翻译理论家，著有代表作《文艺翻译和文学交流》。中译本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7），蔡毅等译。

② 参见斯坦纳同上书，第238页。

③ 参见巴尔胡达罗夫同上书中译本，第30页。

底，永远是一门艺术。”^①这自然是对各种文体或类型的翻译所作的全面而笼统的提法。我倒是赞成对不同文体或类型的作品的翻译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即对论说（如政论、哲学论著等）、科技和文学作品的翻译订出不同的要求，而不是言必称“信、达、雅”或厘定“准确、通顺、易懂”等以不变应万变的统一标准。

“综合”这个概念是提到日程上来了。究竟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尚待求得具体的解答。目前只能说：前景未卜。怎么办？鄙意以为，唯一的办法或途经乃是继续发扬探索精神。这也是我们要从西方翻译界同行们学习借鉴的首要精神。正如《简史》所揭示，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硕果累累，但也不免有欠妥之处。关于“语言决定思想和世界观”、翻译要“不增、不减、不改”、“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等观点和比喻，以及“同等效果”、“同等反应”论等等，便值得商榷。但他们有个突出的优点：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前进的勇往直前精神。这是有目共睹的。正是这种精神将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而且一浪高过一浪，永不止息。《简史》的作者表现了这种精神，对西方翻译的历史作了可贵的探索，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和引进西方翻译界的先进经验，也从其失误中吸取教训，以至开展中外翻译对比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线索和论据，这是令人无比欣慰的。

我愿引莱辛^②的一句名言作为结束语：“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可贵。”

南 木

1986年6月15日

晨光熹微，于北京。

① 参见巴尔胡达罗夫同上书第208页。

② 莱辛是18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

目 次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3
第二章 古代翻译	15
第一节 早期翻译和安德罗尼柯、西塞罗	15
第二节 早期《圣经》翻译和哲罗姆、奥古斯丁	27
第三章 中世纪翻译	41
第一节 中世纪初期的翻译和波伊提乌	41
第二节 中世纪中期的翻译和托莱多“翻译院”	47
第三节 中世纪末期的翻译和民族语言	50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68
第一节 概论	68
第二节 德国的翻译和路德	70
第三节 法国的翻译和阿米欧、多雷	85
第四节 英国的翻译和诺思、弗洛里欧、荷兰德、查普曼	89
第五章 近代翻译	106
第一节 概论	106
第二节 法国的翻译和巴托	109
第三节 德国的翻译和施莱尔马赫、洪堡	128
第四节 英国的翻译和德莱顿、泰特勒	140
第五节 俄国的翻译和普希金、茹科夫斯基、别林斯基	173
第六章 现代翻译	189
第一节 概貌	189
一 传统时期的翻译	189
二 新时期的翻译	203
第二节 现代翻译理论与学派	218
一 传统时期的翻译理论	218

二 新时期的翻译理论	240
1. 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	241
2. 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	248
3. 美国结构学派	267
4. 交际理论与奈达	271
5. 苏联翻译理论的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	283
西方翻译史大事记	304
参考书文选目	312
重要人名索引	317

前 言

本书叙述了自古迄今的西方翻译发展史。第十章概述西方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对几个主要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在以后各章中,分时期、分阶段对西方翻译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全书注意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各历史时期,特别是对二十世纪(直至八十年代中)西方翻译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介绍和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也进行了初步的剖析和探讨。

西方的翻译史,自古至今,历时达两千余年,其译事活动之纷繁交递,译者与译论之丰富多采,良非二、三十万言所能尽其全貌。这部简史只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愿它能为我国翻译界研究西方翻译动态,借鉴西方翻译的学术成果,提供一些材料和线索。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Eugene A. Nida)、加拿大翻译与语言教学史学家凯利教授(L. G. Kelly)和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教授(Peter Newmark)为作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数据和史料,并通过面谈或通信就有关问题向作者坦述了他们的见解;商务印书馆的沈凤威先生和本书的责任编辑杨枕旦同志给本稿的补充修订提供了宝贵意见;南木同志在酝酿和编写本书过程中始终给予作者以热情的关注和无私的帮助,还承担了全稿的审订工作并允为作序;湖南师范大学科研处、深圳大学科研处在研究经费上给予作者大力支持。对于所

有这些帮助和支持，作者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由于水平和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在史料的收集、整理、编排和分析上，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有机会充实修订，使之逐步臻于完善。

谭 载 喜

第一章 绪论

一

任何一门学科的进步都离不开总结和借鉴前人的经验，其中也包括外国人的经验。翻译亦复如此。本书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旨在通过回顾以往，使我国读者对西方翻译的历史有个轮廓的了解，以期从中有所借鉴，有助于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更大发展。

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翻译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以至人类的)文明首先应归功于翻译工作者。因为，从古罗马帝国到欧洲共同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建立到联合国组织的形成，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包括哲学、文艺、科学、技术等)交流和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交往和沟通，无不是通过翻译人员的参与而日益扩大和加强的。那么，西方的翻译活动到底有多长的历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有哪些主要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主要译了哪些作品，提出了什么样的翻译理论，有多少翻译流派，今后可能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翻译在历史长河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所有这些乃是人们要了解也是本书要讨论的范围。

二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圣经·创世记》中记述的以色列人约瑟兄弟旅居埃及，公元前 449 年希腊和波斯签

订卡里阿斯和约，古罗马帝国为其军队招募日耳曼士兵，也无疑都要依靠译员的作用。就是在我国，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在各地言语发音不尽相同、彼此交流甚少的当时，也不可能不通过“象寄之才”（即翻译人员）以“达其意，通其欲。”（《礼记》）然而，这些译员是谁，史书上并无明文记载，或尚未为历史学家所发现。西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论述翻译史，只能从有历史见证的时期谈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七十二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在公元前三世纪问世，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六次高潮或可分为六个大的阶段。首先是肇始阶段。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个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是宗教性质的。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奉的经典。《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四世纪达于高潮，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 382 至 405 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末期和中世纪初，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垄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字材料。

中世纪中期，即十一至十二世纪之间，西方翻译家们云集西班牙的托莱多，把大批作品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友好接触，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个高潮。原来，早在九世纪和十世纪，叙利亚学者就来到雅典，把大批希腊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带回巴格达。在巴格达，阿拉伯人又把这些著作译成阿拉伯语，巴格达一时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古希腊文化的中心。后来，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的。于是，托莱多成为欧洲的学术中心（类似于巴格达的“翻译院”），翻译及学术活动延续达百余年之久，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十四至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特别是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的十六世纪及尔后一个时期，翻译